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尺度的社会发展及其历史本原

刘荣军

(西南大学 学报编辑部,重庆市 400715)

摘要: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尺度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以宏大的历史尺度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成为他论述社会发展理论的哲学总纲领。马克思通过劳动性质、财富尺度和自由时间这三个基本维度,不仅从“自由个性”、“自由劳动”与“自由时间”相统一的角度揭示了人和社会互动生成的社会历史机制,而且从“实体”与“主体”相统一的角度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本原。

关键词: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本原

中图分类号:B03/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7)02-0093-06

如恩格斯所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241}。以这种视角来看作为《资本论》“最初手稿”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不仅提出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尺度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人和社会互动生成的社会历史机制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本原^①。

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尺度的三大社会形态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说过这么一段经典论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107-108}在这里,马克思以他详尽剖析了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依据,将整个人类社会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

关系”和“自由个性”这三大历史阶段(时期、形态)。显然,就这一划分的宏大气魄和独具一格而言,它就成为马克思论述人的全面发展及以之为尺度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总纲领”。

在马克思看来,在第一个社会阶段即前资本主义阶段,个人之所以形成“人的依赖关系”,这是因为他们之间的“自然联系”;这种自然联系,马克思说它“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自然联系”之“自然发生”,就在于个人一开始生产就无可选择地“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2]25}。由于人受狭隘的共同体限制,使得他们成为人群的附属物,因而此时的人并无自由而全面发展可言。而到了第二个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个人由于“摆脱了自然联系”而代之以物的“社会联系”,因而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正是这种物的“社会联系”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物的关系”说到底只是“各个人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的自发的联系”,这种联系借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个人还处于创造自己的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因

^① “本原”,哲学上指一切事物的最初根源或构成世界的最根本实体。本文指对事实“原本”的探求,即对历史本原、生产力本原的本质追问,因而是“发生学”意义上的“本原”,而非“本体论”意义上的“本原”。

此,为了使人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2]111-112},就必须由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跃进,实现“物的联系”向“全面发展的个人”的转化。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虽然在第一个社会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时期,人受狭隘的共同体限制,此时并无人的全面发展可言,在第三个社会形态即人的自由个性时期,人摆脱了“人的”和“物的”两种限制,呈现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面貌。但是情况复杂的却是第二个社会形态即物的依赖关系时期——它既打破了第一个社会形态人对人的限制,开启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历程,又由于物的限制而不能完全地实现人的全面的发展,因而呈现出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奇特的矛盾景观。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马克思对第二个社会阶段着墨较多,多方面地论述了这一社会形态的矛盾关系,比如,人的独立性和人对物的依赖性,人的全面性和人的普遍异化性,人的孤立性和人的普遍的社会性,等等,而其最根本的矛盾则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又不能将人的全面发展贯穿到底。

循着这一思路可以发现,在马克思那里,无论是“物的联系”的出现还是“全面发展的个人”的生成,都“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就是说,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与他关于社会历史的价值追求始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种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性使得社会发展过程成为了可能。

二、人的全面发展的三个基本维度及其社会发展机制

如果说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最终目的,那么,马克思是通过相互联系着的三个基本理论维度来展开论述他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社会机制的。

(一) 劳动性质的历史演进与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首先是从劳动的性质方面进行规定的。他说:“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要,……诚然,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被看做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做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

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2]615}如果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只是从人与动物的外在对比上分析人的劳动本质的话,那么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深入到了人的劳动特性的内在分析上,因而是关于劳动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的完整说明。

当然,劳动的对象化本质促使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这是对劳动的性质和趋势的一般规定,因而它舍弃了劳动在不同时期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不同作用方式,具有逻辑推论或抽象的意义。然而,正如任何一般都要表现为个别、只能通过个别才能显露那样,劳动的一般规定也应如此。因此,马克思又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劳动的不同性质。马克思说:“这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是这种对立的劳动;另一方面与此有关,是这样的劳动,这种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从而使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2]615-616}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事实上是对劳动作了不同历史形态的区分:(1)谋生性的劳动。这种劳动发生在第一个社会形态即前资本主义阶段的人的依赖关系时期。劳动创造了人,人获得了劳动的本质,但人的劳动一开始只能“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进行,因而此时,劳动能力的低下已使劳动充满了艰辛,再加上人身等级依附关系的压抑,人们就只能在对象化的劳动中体味谋生的意义而顾不上去体察对象性劳动的其他性质了;(2)对立性的劳动,也就是异化劳动。这种劳动发生在第二个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阶段的物的依赖时期。资本主义以机器体系的大工业为生产力发展的坚实基础,以资本的永无止境的扩大自身的特性为生产力发展的不竭动力,以科学的发现和应用为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杠杆,使得人的劳动能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提高。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狭隘性”以及资本的贪婪性和财富的相对不足性的矛盾,这时的劳动必然呈现为对立的即异化的劳动。这种异化劳动,一方面因人的劳动产品作为商品在社会上广为流通,使得劳动着的人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获得了前一个社会形态所无可比拟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与劳动的对立即物的增值导致人的贬值,使得劳动着的人并不能真正觉察与体味到自身的主体性地位,人在劳动中意识到的主体地位往往以无限制的占有欲(对别人财富的巧取豪夺;对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表现出来;(3)自我实现的劳动和真正自由的劳动。这种劳动发生在未来的第三

个社会形态即后资本主义阶段的人的自由个性时期。随着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无限制地创造财富的伟大文明作用的终结,社会的剩余财富和自由时间的大量涌流,人们在劳动的对象化中也就真正能感受到自身的主体性地位,意识到在劳动中人的创造性的本质力量的自我实现。特别是当劳动具备了“社会性”和“科学性”两个条件时,“自我实现的劳动”必定会进一步转化为“真正自由的劳动”即“个性的劳动”^{[2]616}。

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劳动的一般性质所作的三种历史形态的区分,正是在人类历史发展或社会形态更替的宏观视野下对劳动所推动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未来前景的深入描绘:从谋生的劳动到异化的劳动再到自我实现的劳动和真正自由的劳动,劳动的对象化的本质既呈现为复杂的面貌又趋于最终的统一。在这一劳动性质的演变过程中,劳动的对象化和人的全面发展,二者若即若离,似显似隐,最后终于合而为一,相互印证。

(二) 财富尺度的历史演变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不仅体现在其劳动过程中,而且也体现在作为劳动结果的劳动产品即财富中。因此,马克思论证人的全面发展的第二个基本维度是财富尺度的历史演进。

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部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2]479-480}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的前提下,不仅以三个“不就是”的反问句论证了人的劳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三种性质,而且还将人的“天赋的绝对发挥”与人的“这种全面的发展”相提并论地称之为“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并且认为人们创造财富的目的,就是“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生产出他的全面性”。这就是说,当马克思将“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看作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本身”时,他已经从社会的财富创造过渡到了人的全面发展^[3]。

进一步说,由于人的全面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又由于人的创造财富的能力有一个从低到高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因而衡量财富增长的尺度在人的发展或人的能力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就有了不同的表现。对此,马克思从深厚的历史感出发,依据他对人的发展的三种社会形态的宏观划分,提出了财富尺度的三种历史性演变:(1)财富的劳动时间尺度与“人的依赖关系”。马克思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4]104}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提出财富的劳动时间尺度,主要指的是第一个社会形态即人类历史发展的前资本主义阶段。这一时期的财富的基本特征是全社会的贫困,人们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让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因此,劳动时间的长短就成为财富增长的尺度;(2)财富的科学技术尺度与“人的独立性”。马克思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多地“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4]100}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提出财富的科学技术尺度,主要指的是第二个社会形态的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即人类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这一时期财富的基本特征是由于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在生产中的应用,社会财富大量增加,从而使得人们在维持生存之余,还可以从劳动时间中节余出一定的剩余劳动时间,成为个人可以支配的自由时间。因此,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就成为财富增长的尺度;(3)财富的自由时间尺度与“自由个性”。在马克思看来,在未来社会里,“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4]104}。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提出财富的自由时间尺度,主要指的是第三个社会形态,即人类历史发展的后资本主义阶段。这一时期财富的基本特征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使得“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能够“充分涌流”^{[5]20}出来。因此,自由时间就成为财富增长的尺度,自由时间不再集中于社会上的少部分人,而是较为平均地为社会上的每个人所拥有。

值得注意的是,在财富尺度演进的人类社会发展序列中,从财富的劳动时间尺度发展到财富的自由时间尺度之间的,是财富的科学技术尺度。正是科学技术尺度,一方面提高了此前的劳动时间的社会生产力,使得从劳动时间中分离出自由时间成为了可能,另一方面又使得自由时间成为个人提高能力的重要渠道,使得社会向个性的自由发展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也许正是科学技术尺度对于社会历

史发展的这种过渡性质,使得马克思不仅一般地分析了科学技术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提出了“科学……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2]539};而且特别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根本特征,提出了“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4]94}。就此而言,无论是马克思说的“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4]94}还是邓小平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6],我们都不能仅仅从科学技术角度本身来理解,而必须将其上升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的高度来认识。

(三)自由时间的历史生成与人的全面发展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发现,无论是劳动的第三种历史形态即“真正自由的劳动”,还是财富的第三个历史尺度即“自由时间尺度”,马克思最终都把它们灌注到了“自由”二字上,认为未来的第三个社会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自由个性”、“自由劳动”和“自由时间”的有机统一。因此,作为劳动性质和财富尺度的基本表现,自由时间如何产生与如何实现(即如何运用)这两个层次的问题,就成了马克思论证人的全面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在马克思看来,整个时间可以被划分为劳动时间和劳动时间之外的剩余时间。劳动时间也叫必要劳动时间,它表示在这种时间里,生产出的产品除了支付劳动者的报酬外可以抵消成本但并不产生太多的结余,这种劳动是社会及个人生存的最低限度,因而用于这种劳动的时间是必不可少的。而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或由必要劳动时间结余而出的剩余时间,由于它可以被个人自由地支配,因而称作“自由时间”。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时间的产生以及大幅度的产生只有在第二个社会形态即物的依赖关系时期才有可能,因而它是这一时期才出现的资本的功能。对此,马克思论述道:如果说资本有着自身的“狭隘性”,那么,由于资本还具有“超越出发点”的“变易的绝对运动”的性质,则“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4]103}。

而问题的另一方面恰恰在于,资本主义能够实现自由时间的大量产生问题,但却不能有效实现自由时间的合理运用问题。因为,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因此,“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

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这个矛盾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是“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4]103-104}。这正是马克思所构思的社会发展第三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仅能够解决自由时间的大量产生问题,而且能够解决自由时间的有效实现(即合理运用)问题。

那么,未来社会究竟如何“实现剩余劳动”?马克思说道:“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2]389}在这里,马克思把人的发展依次灌注在了发展人的一切属性、联系、需要和能力上,从而展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面貌^[7]。

进而言之,人们在“自由时间”里从事的活动实际上就是“真正自由的劳动”即“个性的劳动”,这种活动或劳动无论如何“自由”与“个性化”,都不会脱离劳动的一般性质规定,就是说,劳动不可能“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马克思以作曲为例说,真正自由的劳动,“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2]616}。正因此,在自由时间里发展的人的诸多能力中,马克思最为看重的还是发展人的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的能力。他说:“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的时间。”^{[2]379}这似乎意味着,人的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能力的充分的或高度的发展,会影响或带动人的其他能力的发展。这些能力再与别的外界物发生联系,就会促使人的其他方面的能力的提高。

至此,我们看到,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劳动性质的历史演进、财富尺度的历史演变和自由时间的历史生成这三个基本理论维度的论述,不仅阐释了未来社会发展阶段中“自由个性”、“自由劳动”与“自由时间”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生成与统一问题,而且也使他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及以之为尺度的社会发展理论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三、人的全面发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本原

值得注意的是,当马克思把“自由时间”作为“自由个性”与“自由劳动”的逻辑归宿后,他在论述自由时间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时又说道:

“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4]107-108} 在这里,马克思显然将“自由时间”、“个人的充分发展”和“最大的生产力”联系起来,不仅说明了自由时间对人的自由发展的基础作用,而且特别强调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尺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本原。

如果说恩格斯曾经就“历史之谜”的谜团说过这样的话:“18世纪没有解决巨大的对立,即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历史一开始就予以关注的,它的发展寓于历史之中。”^{[8]528} 那么在马克思看来,对这一“历史之谜”的解答,包括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内的近代西方哲学的解答,在历史科学上之所以陷入“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9]这样的根本缺陷,完全是因为他们哲学基础的“思辨哲学”所在:思辨哲学始终无法穿越自身,切中外在的超越之物。因此,要想建立科学的历史理论,首先必须解决历史的哲学基础,即历史的逻辑起点问题。这一逻辑起点必须有助于“实体即主体”问题的解决。而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便会发现:马克思以“实践”概念的确立和“生产力”概念的生成及这二者与“现实的个人”的关联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恰恰有助于“历史之谜”的科学解答。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社会历史的活动,归根到底是人的实践活动。没有人和人的实践活动,也就没有社会的历史。因此,对历史观理解的首要之点就是关于实践概念的理解。然而,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人的实践本质即感性活动又源于人的劳动(生产)本质,源于为满足人的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而任何形式的物质生产活动,都是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统一,都是人对自然的改造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统一。如果说这“双重关系”分别代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分别体现了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不同方面。诚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4]101} 我们看到,马克思通过“实践”概念所蕴含的“感性活动”的规定,富有内容地引导并过渡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

进一步说,由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9]123},因而,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关键在于理解生产力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任何生产力的发生与发展,实质上都是

“现实的个人”经由“他们的活动”对“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创造和“他们生活的生产”。显然,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还是“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共同活动的方式”,都或者作为生产力的前提,或者作为生产力的产物,具有了一种“实体性”(“客观性”、“物质性”)的特征。

从另一方面看,虽然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先前时代的“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活动的产物,但是,由前人留下的一定生产力,只是在新一代“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把它作为存在对象从而为这“过去”注入“现在”的活力时,它才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并获得新的发展,因而,“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9]124}。从我们前面关于劳动性质、财富尺度及自由时间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人作为生产力中的活的因素或首要因素,可以使生产力发展呈现为维持型或循环型,也可以使生产力发展呈现为飞跃型或超越型。人作为社会劳动的主体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在前一种情况下,还不是“最大的生产力”,只有在第二种情况下,才能成为“最大的生产力”。人之作为生产力的发达与不发达的根据,就在于人是否在自由时间里拥有了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的“真正自由的劳动”的能力。正因此,马克思才说:“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4]104} 也就是说,个人只有成为“发达的生产力”,他才能够不仅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而且使他本身成为生产力中的“真正的财富”,从而在“个人的充分发展”和“最大的生产力”(“发达的生产力”)的统一中使生产力获得“主体性”(“精神性”)的特征。

把上述生产力的“实体性”和“主体性”结合起来,我们看到,马克思之所以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具有“历史科学”性质的社会发展理论,首先就在于他在论述以人的实践活动即感性活动为基础的物质生产活动时,确立了“生产力”概念的基本特征——生产力既不是先验形而上学的,也不是自然永恒的,它本身就是历史的,是历史地生成、变化与发展的——及其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性;而正是生产力的这种历史生成性及其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性,不仅使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同一切历史唯心主义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区别开来,而且使得马克思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科学地解决了“实体与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从而解答了“历史之谜”。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

义之生产力本原的深刻之处！

那么,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本原之“实体性”与“主体性”统一的理论,与我们前面论述的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马克思从“实践”概念科学合理地、富有内容地引导出“生产力”概念并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这是一回事;而如何分析具体的社会结构并解剖具体的历史阶段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本原的具体化的内在要求,因而又是一回事。正是这后一个问题,使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之“实体性”与“主体性”统一的理论在他对劳动、财富与自由时间的三维论述中获得了具体化的表现。这其中的逻辑关联是:马克思从劳动、财富与自由时间这三个角度理解人的历史发展,从人的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说,社会发展的规律与人的活动的规律在“生产力”这个关节点上获得了“实体即主体”式的完整的统一。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是通过“生产力”概念的内部体系(系统)及其相互关系(如个人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客体生产力和主体生产力、直接生产力和间接生产力、现实生产力和潜在生产力等)来解决的;而他对这些生产力概念及其关系的解决,又是从“劳动生产力”与“财富生产力”的关系着手的;而劳动生产力与财富生产力,在现代社会都表现为“资本生产力”。诚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因此,资本本身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

体。”^{[2]587}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生产力是一种“普照的光”,“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2]593}。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资本主义的财富生产虽然也具有“发展人类的生产力”的作用,但是它毕竟导致了目的与手段的异化,它将财富的发展看成了目的,而将人的发展看成了财富生产的手段,正因此,马克思从财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暂时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10]可以看出,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本原,最终落实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批判上。从原则的高度来认识,我觉得这正是马克思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崇高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刘荣军.财富、人与历史——马克思财富理论的哲学意蕴与现实意义[J].学术研究,2006(9):71-76.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5.
- [7] 刘荣军.论人的需要与人的全面发展[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51-55.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70.

责任编辑 张颖超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Dimension of Human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the Historic Origin

LIU Rong ju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dimension of the human all-round development put forward by Marx in his Economics Manuscript From 1857 to 1858 became the general philosophical guidelines of his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Through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nature of labour, wealth, and free time, Marx demonstrated the interactive generation between individual person and society, and showe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t productive orig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bject”-“subject” unification.

Key words: human all-round development; social developmen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oductive origin